

中国 农村 研究

CHINA RURAL
STUDIES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2004年卷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
农村研究
CHINA RURAL
STUDIES
2004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研究. 2004 年卷/徐勇主编. -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5004-5708-1

I. 中… II. 徐… III. ①农村经济-中国-文集
②农村经济-中国-文集 ③农民-问题-中国-文集
IV. ①F32-53 ②D422.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1423 号

责任编辑 李尔柔

责任校对 宗 和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农村研究》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陆学艺 张厚安

主 编：徐 勇

副 主 编：项继权

执行编辑：刘义强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 挺	王敬尧	王金红	邓大才
刘义强	何包钢	吴理财	李德芳
陆学艺	杨海蛟	项继权	徐 勇
唐 鸣	高秉雄	曹 阳	谢庆奎
景跃进	董江爱	詹成付	戴慕珍

目 录

历史回眸

社会主义中国农村走向何方？

——建国后农村社会改革的实践与反思 张厚安 (3)

单向度开放的农村社区

——对安徽荣花村的调查 彭大鹏 (62)

追寻集体化

——剪子湾村田野调查札记 行 龙 (100)

公社制度与中国乡村的未来 宋圭武 (112)

理论探讨

“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 徐 勇 邓大才 (125)

关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纵向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

——政府间事权划分及财政分工视角 暴景升 (153)

江汉平原稻农耕地适度规模测算 陈风波 丁士军 (172)

实证中国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 符 平 (185)

咸安政改：体制内的增量改革

——咸安横沟桥镇综合配套改革调查 吴理财 (212)

“后税改时代”我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

——湖北省罗汉寺村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实践报告 袁方成 (224)

学界纵评

- “后农业税时代如何建设新农村”研讨会综述 徐容雅 (261)
- 如何认识转型时期“城中村”的社会性质?
——评蓝宇蕴《都市村社共同体》及
《都市里的村庄》 王金红 (269)
- 以乡村为支点的中国政治学的想像力
——《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的启示 刘义强 (281)

历史回眸

△社会主义中国农村走向何方？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农村改革的实践，作为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我亲眼目睹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是见证者；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重大的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也是党的政策的执行者；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被下放到农村当了一年多的“社员”，又是党的农村政策的身受者。同时作为一个从事了五十多年马列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我不仅能够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讲述这段历史，来回忆改革的经过，并且能对半个世纪来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从理论上进行反思。

△单向度开放的农村社区

社区历史是由生活连缀着的。农民虽然不是理论家，但他远比任何理论大师更是地方知识的专家，他在自己的文化和生存逻辑中理解国家的行为、现代化的推演以及自己的文化传统，他所得出的结论虽然可能和宏大的理论相悖却无疑具有地方合理性。在社区这狭小的场域里，农民似乎是当然的主角。在传统社会的相对平静时期，人们是自己文化下的奴隶^①；转折时期，农民隐然又是历史的推动者；农民在自己社区里的行为在局外人看来是如此不可理喻，但当他们从土地上挣脱出来的时候，其算计的能力又是如此惊人。农民到底是被操纵的玩偶，还是若愚的大智慧者；农民到底是道义小农，还是理性小农，抑或就是其他等等？或许只有真正理解了变革中的乡土社会才能理解当下的中国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着的改革的深刻性。

① 当然，这种文化是由历史传承和帝王国家共同构建的结果。

△追寻集体化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无论冠之于集权统治模式还是其它，有一点毋庸置疑：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集体和个人，政治和经济等应有的界限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数亿国民凭借被动员起来的热情所支持的中央、国家、集体和政治，而复杂多样的社会生存图景则隐匿在了宏大的、单一的政治式的追求之中。我们应该走向田野，回归历史，努力以一种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集体化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乡村社会日常生活实践的逻辑和结构，进而为将来社会的稳步上进凸显出其前瞻性的效用来。

△公社制度与中国乡村的未来

乡村发展事关中国发展的根本。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国乡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乡村现代化模式选择的一次大胆尝试。如今，公社已成为过去。但反思历史，公社模式的有关精神和思路仍对中国乡村的改革和发展富有启迪意义。未来中国乡村的发展，应当积极借鉴公社模式的有益成果，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

社会主义中国农村走向何方？

——建国后农村社会改革的实践与反思*

张厚安（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编者按：张厚安（Zhang Houan），男，1928年元月出生，湖北省汉川市人，汉族。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顾问、政治学教授，湖北省政策研究会顾问。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张厚安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教学和研究。“文革”后，是全国最先致力于政治学学科重建的少数学者之一。近二十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基层政治组织和村民自治的研究，并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被报刊誉为“走向乡土大地的学者”。主编和撰写的主要著作，在政治学方面有：《通俗政治学》（获省优秀成果二等奖）、《政治学》、《简明政治学》、《政治学辞典》、《简明行为学辞典》、《政治学考试纲要》、《科学社会主义》（获国家教委教材一等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获省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奖）、《政治学丛书》等，是《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撰稿人；在农村问题方面有：《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中国乡镇政权建设》、《中国县以下层次区划模式》、《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被评为1996年“五个一工程”的一本好书并获一等奖）、《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乡政村治”的模式》、《山东省莱西市村级建设“三配套”的实践》、《乡村政治制度建设》等。由他和徐勇主编的“村治书系”，《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已经出版，《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

* 此稿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张厚安教授对中心研究生一个讲座的内容。张教授讲授内容由朱红萱、杨为学、卓惠萍等同志协助整理，最后由他本人修改定稿。

试验》等书也将陆续出版。他撰写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系列论文”获一九九五年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一等奖。

引 言

我的后半生在学术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了全国政治学学科的重建，并使华中师大政治学课程在全国得以领先开设。二是从七十年代末就转入重点研究农村问题，并创建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二十年前我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即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工作者也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所谓理论工作者要“务农”就是要使我们的理论研究立足于农村的改革，服务于农村的改革。要改变过去那种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教条式、经院式的研究方法。要深入实际，特别是要深入农村。

全国人大第十届三次会议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温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三农”问题提问的时候，他引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经济学就是农民的经济学，就是农村的经济学。温总理还讲到我国现在的农村改革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方针的阶段，对农民要“多予、少取、放活”。

2004年北大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农村问题的学术研讨会，由于工作时间上的冲突，我只提交了相关论文，未能到会。在论文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民的小康也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和小康。人们常说‘无农不稳’，但是如果务农者不能和务工、务商等行业的人一样快地富起来，又怎么能够调动广大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呢？今天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固然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一些非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我们还应当看到因为农村人口无序的大量外流所造成的如土地抛荒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谁务农谁吃亏’的状况。务农的人吃亏，务农的县吃亏，务农的省吃亏，谁务农谁

吃亏。必须防止城乡差别的扩大，应该通过城市支援乡村，工业支援农业，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科学种田，从而减轻农民繁重的体力劳动，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减轻农民的负担，使多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能与城市人，与从事其他行业者一样的得到同步的提高。只有这样，广大农民才会安心生活、居住在农村，才能安心务农，只有这样，再加上其他改革措施，农业才能更快地发展，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国泰民安。现在农民最根本的问题是不愿意生活、居住在农村，不愿意务农。根据最后一次人口普查，在我国有 63.9% 的人口生活、居住在农村，共 8.0739 亿人。如果脱离了‘8 亿农民’，也就脱离了人民的大多数。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二十多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全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成绩斐然。现在，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决定从 2006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民的农业税赋。同时，中央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居住环境，以期缩小不断扩大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但是，解决‘三农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农村改革的实践，作为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我亲眼目睹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是见证者；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重大的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也是党的政策的执行者；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被下放到农村当了一年多的“社员”，又是党的农村政策的身受者。同时作为一个从事了五十多年马列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我不仅能够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讲述这段历史，来回忆改革的经过，并且能对半个世纪来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下面我想分成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与公社化）、1978 年拨乱反正后农村的巨变和我们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村治”实验的启示四个部分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希望对今后农村的深化改革有所裨益。

一、土地改革

——从 1950 年“红安试点”谈起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取得胜利，主要是依靠农民，依靠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结果。

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能否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是解放战争成败的关键。而农民问题的实质又是土地问题。谁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能得到农民的拥戴。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纲领。其中心内容也就是要实现如孙中山主张的“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兑现对农民的承诺。武汉市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1950年，当时的中南局就决定在湖北省的黄安县（后改为红安县），进行土地改革试点，为期一年。我被中原大学指派，参加了黄安县的土改工作队，亲历了这场土地改革。土改就是为了实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纲领。

土改工作队首先在孝感集训，提高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学习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政策。随后我们背着四十多斤重的行装步行三天到达黄安县，当时的黄安，生产水平非常低下，田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荒凉景象。绝大多数农民吃不到米饭和白面，都是吃红薯，而且还是红薯根、苕叶并带有泥沙。广大贫苦农民温饱问题都未能解决。“早上三碗苕，中午苕三碗，晚上苕当饭，明天早上还是苕。”这就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下去之后，我们工作队员也和农民一样餐餐都是苕。

下面我讲的虽然是红安1950年土改的情况，但是它却带有一般性，从中也可以得出一些共同的结论。

首先在我们下村以前，对那些有重大恶迹、有民愤的危险分子进行了摸底排队，并对其中最危险的人进行了严格的监控。下村以后，土改工作经过了几个较大的环节：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划阶级斗地主、镇压反革命和恶霸地主、分田地（和地主的房屋和财产）、复查、政权建设，然后转入发展生产。其中，发动群众和划阶级又是整个土改运动成败的关键。

扎根串联深入发动群众

充分发动群众是土改顺利进行的基础。当时的农村，封建宗族房头关系影响极深。农民中非常重视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并以此来分亲疏。我们针对此就大力宣传阶级观念、强调阶级亲，宣传剥削与被剥削和谁养活谁的道理，来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

但是这一工作的难度很大，因为地主、富农与贫民、雇农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都是在一种亲情、一种叔伯、兄弟等关系的外衣下掩盖着。特别是一些老实的农民，长期来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地主、富农看在亲戚关系上，租土地给自己或者雇佣自己，生活可能会更困难。他们对地主、富农

往往更多的是感激，而看不到是自己的劳动养活了他们，认识不到自己受剥削的道理。

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下村后，第一步就是要进行访贫问苦找到一个几代人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住户，也就是要扎正根子。可是我们下去以后，那些主动接近我们的，往往不是我们想依靠的贫苦农民，而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流氓无产者。后来土改中，有一些地方运动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却出现了捆绑吊打和为了挖地主的浮财甚至逼死人等违反政策的做法，大多就是因扎根不正所造成的。所以当时非常强调扎好根。只有根子扎正了，那么通过土改根子再去串联其他人就比较可靠了，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到一个叫袁家畈的村子去土改。这是一个千户以上的大村。这也是旧社会的一个土匪窝子，因男人当土匪被镇压而成为寡妇的就有一百多人。这个村的民居建筑非常有“气势”，不少人家里都修有暗室、暗道，整个村落纵横交错极其复杂。这也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的村。我背着背包来到村长家，村长初步介绍了情况之后，问我住在哪一家，我一时无从决定。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说今天就先住在村子的公屋里吧。于是村长把我带到了在村头上的袁家宗族祠堂。这是一个非常高大宽阔的祠堂，祠堂四壁摆放着许多村里老人准备去世后用的棺木。村长叫人把一副棺木抬到祠堂中间并把盖子翻了过来，再放上一捆稻草就算是我的床了。我把背包打开，铺上被子，关上祠堂的大门就睡到这棺材盖上。屋里一片漆黑，外面刮着大风，脑子里盘算着明天怎么深入群众，找到一个可靠的住户，心里却害怕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在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越怕越睡不着。到了深夜，祠堂里不断地发出了喳喳的响声。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因为祠堂年代久远，四周板壁干裂发出的声音，吓得我将头紧紧地蒙在被子里。这一次我也领教了什么是“度日如年”了。第二天天一亮，我赶紧找到村长对村里住户进行摸底排队，然后进行家访，找到了一户经过详细走访、调查，认为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条件的住户住了下来。

发动群众是艰难的，但是一旦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后，他们爆发出来的热情和声势也是巨大的。红安是革命老区，也是一个山区，到了冬天，天气越来越寒冷，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大家围在用树兜燃

烧的火，边取暖，边唱着“谁养活谁”等革命歌曲，边讨论问题。当时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并由贫雇农和中农组成农会。在以后整个土改的过程中，一切重大问题都先经贫雇农讨论，然后通过农会把政策交给广大农民去贯彻执行。

充分地发动群众乃是土改顺利进行的基础。有些地方后来在复查中发现许多问题，存在着夹生饭，其根源都是由于发动群众不够，或者依靠的人出现了偏差所导致。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土改工作队员都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被轮流派到贫农、雇农和中农家里吃饭，每天交一毛钱。有一天我被派到了一家患有肺病的贫农家里，虽然他不断地咳嗽、吐痰，家里卫生条件极差，我还得硬着头皮与他们同桌吃饭。也是在土改时期，农民手把手地教会了我犁地、栽秧、割麦子等农活。也正是在这期间培养了自己对劳动人民更深的感情，加深了劳动观念。这就是说，发动群众的过程既是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过程，也是自己接受他们教育的过程。

划分阶级，“劳动不劳动分地富”

划阶级就是要分清敌、我、友。因此严格地按照政策正确地划分每个农户的阶级成份，对所有的村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情，同时这也是土改成败的关键。

当时，根据土改政策将农村阶级成份划分为：贫农、雇农、中农（佃中农、中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这并不是成份，只是因为其主要生活来源非土地收入）。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在少数贫雇农积极分子（也就是我们依靠的土改根子）会议上对全村逐户摸底排队，计算各家的人口、田地、家庭成员是否参加劳动，是否有土地出租或者租有他人的土地，是否有雇工或者受雇于人，是否放有高利贷或者受高利贷盘剥，除土地外是否有其它收入，计算每户解放前三年的主要生活来源，搞清解放前每户家庭成员的变化（如：娶媳妇、嫁女儿等）；接着在村农民协会大会上报告各户的基本情况，请大家进行审查、比对；在各户自查和互查的基础上出榜公布。情况基本弄清楚，大家无异议后，再开会划阶级。采取自划和互划的办法，很快谁家贫农、谁家雇农、谁家中农、谁家地主或者富农就出来了。少数有争议的农户暂不定案，进一步了解情

况后慎重处理。

在划阶级过程中有几个难点：（1）佃中农与贫农的划分。二者都租有地主较多的土地，都受地主剥削。不同的是：贫农自己较少的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缺少耕牛农具，生活贫困；而佃中农一般自己较多的土地并且农具耕牛比较齐全、家庭劳动力比较强，农副业等各种收入较高、生活较好。我们在二者界限难区分的时候，往往是就低不就高，都划为贫农。（2）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划分。二者都有土地出租，或者雇有长、短工，都有一定剥削，不同的是二者剥削数量的区别。当时政策的规定是剥削量超过其总收入的25%的就应划为富农，有剥削但是其剥削量不足25%的是富裕中农。也就是说剥削量超过25%是二者从量变到质变的分水岭，而这一点往往很难把握。在当时，有掌握从严的倾向，把那些可划可不划为富农成份的农户也划成了富农。（3）地主和富农的划分。劳动不劳动分地富，不劳动而拥有大量的土地，完全靠雇工和出租土地过剥削生活的才是地主。但是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农户拥有土地数量很大，有雇工，并且出租土地，主要收入是剥削所得。但是，家庭主要成员又参加部分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当时为了满足贫雇农多分土地的愿望，我们往往把他们的这种劳动说成是监督雇工而进行的“监督劳动”，说监督劳动不算是劳动。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说是一种“左”的倾向。

在划阶级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并与地主、富农划清界限，从一开始就强调要通过斗争来取得胜利，一再强调要防止“和平土改”。所以划分阶级最后是以斗地主来完成的。

为了斗倒地主，工作队员都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那天，是我工作的刘仁里村开展对地主斗争会的日子。县长程鹏同志亲自下来视察，他坐在斗争会场的最后边观看。斗争会开始了，首先由贫雇组组长发言诉说这个地主的发家史，控诉了他多年以来对本村贫苦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接着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言，发言很踊跃，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不断有人带头呼口号。但是这个老地主就是不低头，表现出明显的不服。我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地主家的那个一直未能发动的老长工站起来了，他不再去算那些剥削账了，一下子把话题转移到地主的家事上来，他用非常具体、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地

主家腐朽、淫乱的生活情节。这是地主分子出乎意料的，他一下子低下了头。我也松了一口气。程县长^①看到这里也绽开了笑容。

在我工作的永和区，还开过两次几个乡群众参加的大型的斗争会。这两次是斗争恶霸地主，通过斗争，当场宣判并处死了几个有命案和重大罪行的恶霸地主。这也是土改过程中发动群众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造成一种强大的对敌斗争的声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套锣鼓一起打。

分田分地，先填“坑”后补“齐”

土改，主要是对地主的田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和房屋予以没收，分配给广大贫雇农。对地主的生活资料一般是不动的。但是，在发动群众的初期，有的地方为了急于让群众享受到胜利的果实，提高斗志，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挖地主的浮财上。特别是那些二流子对此最为积极。他们首先把矛头放在追地主的金银财宝上，有些地主分子也因害怕，暗地里将财产分散到亲戚朋友家，或者埋藏在地下。对地主的浮财群众心中是无数的，只是猜测他们可能有什么，有多少。为了挖出更多的地主浮财，不少地方都发生了违反政策的做法。有时，土改工作队员到队部开会去了，积极分子在村里就私设公堂追地主浮财了，于是捆、绑、吊、打等错误的做法都出现了。

根据政策在土改中先对地主的田地和生产资料、房屋全部没收。对富农则是没收其多出的土地，对其房屋农具一般不动。对待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土地、农具、财产是不准动的。在分配中，则是先满足贫、雇农，叫做“填坑”；然后补给佃中农不足的部分，叫做“补齐”。对于地主分子及其家属则分给同等的一份。土地改革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但绝对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每一个人。土改的目的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也是要把每一个地主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新人。另外，在分田地时，我们并没有对全村的土地重新丈量，而只是根据原有的地契和大家的记忆（本村田亩的情况，农民都很清楚，他们能一块一块的讲出来），经过贫雇农和佃中农的讨论、协商，肥沃的与贫瘠的搭配、离村远的和离村近的搭配、水田与旱地搭配，比较顺利地获得公平

^① 前红安县县长程鹏同志曾因种试验田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而闻名全国。目前程鹏同志虽离休在家，但仍然关注着农村的每一步改革。

合理的解决，大家都很满意。

田地分完后，经过一段时间，工作队又组织了复查。复查的重点是查阶级划分是否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查漏划、查错划；其次查土地、农具、房屋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特别要求检查是否按政策分给了地主分子及其家属同等的一份。有不少地方分给地主的那一份往往是最差的。只有通过了复查的地方，才算土改工作基本结束。

土改后，村子里架起了电线，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并掀起了办夜校、扫文盲、学文化的热潮。各村还自发地组织起了生产互助组，准备春耕生产。土改翻身后的农民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发自内心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

选举乡干部，投下神圣的豆子

土改完成后，接着进行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当时县以下是区公所、乡（镇）政权和村公所三个层次。区公所是县的派出机构，村公所则是乡（镇）的派出机构。“村”称行政村，有的是一个大自然村设有一个村公所，这个大自然村就是一个行政村；有的是若干个小自然村合设一个村公所，那么那些小自然村加在一起才是一个行政村。村公所主要完成乡（镇）政府交办的各种行政工作，和今天的自治村是不同的。“村”设村长一人，秘书、干事各一人。所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主要是指乡（镇）政权建设。

这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还没有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所以当时建立乡（镇）政权主要是成立乡一级人民政府。

翻身后的农民政治热情高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各乡乡政府选举动人的情景。其过程是：先由各村选出代表若干名，同时经各村代表反复酝酿提出乡政府成员候选人名单。最后由土改工作队汇集确定了十四名候选人组成的统一名单，再交各村讨论提意见后，由工作队和乡农协委员会确定一个正式的名单并予以公布。当时提出的乡政府候选人，多数都是土改工作中我们培养出来的翻身队成员或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所以意见很容易统一。最后由各村选出的村民代表来投票选举乡政府成员。

乡政府选举是在露天举行的，会场布置既简单又隆重，除村代表外各村群众都穿着新衣，兴高采烈地来观看这次史无前例的选举。当时的场面